内江縣文史資料

〔第 四 期〕

内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
政协内江县委员会

一九八三年三月

目 录

抗日期中内江食糖的查封禁运和蔗农贷款内幕……周凤梧（1）
反对国民党政府食糖征实的经过……曾祥元 曾 翥（4）
一九四七年内江蔗农请愿记……赵文林（6）
蔗的谣谚（补白）……阿 洪辑（7）
解放前内江食糖经营简况……宋子麟供稿 傅长澜整理（8）
原内江甘蔗改良场的设置规模……袁正铭（11）
华农糖厂与内江蔗糖生产合作社的建办……刘建纯（14）
内江糖房遵义开（蔗糖生产小史话）……陈靖方（15）
糖的谣谚（补白）……阿 洪辑（18）

艺·苑·杂·俎：

江城书画舫：二、人物仕女画师陈石渔绘事生涯……陈靖方（16）
汉安诗词丛话：
四、明代内江的两个女诗人 五、明、高氏昆仲诗抄 六、梅友松总督遗诗二首
……笑 楚（19）
内江（川主凼）《刘氏族谱》摭谈……白 马（23）
内江《刘氏族谱·外纪》对联选录（二十六则）……刘宗承 辑（26）

附图片五张：陈石渔人物画照二幅 《县志》、《刘氏族谱》书影二幅 古犀牛洞一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抗日期中内江食糖的查封禁运和蔗农贷款内幕

周凤梧

抗日战争的第五个年头，即1940年，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迁到了重庆，人口逐步增加，物资供应也日益紧张起来。兼之四大家族乘机攫取，物价不断上涨，人民生活日趋困难。国家总动员会议为了控制物资，平抑物价，稳定后方，议定在成都、宜宾、万县、内江等地区设立国家总动员会议专员办事处。成都是邹明勋，宜宾是张一寰，万县是×××，内江是周凤梧。内江主要物资是蔗糖。川康区食糖专卖总局设内江，局长曹仲植，副局长张川。内江分局黄某某，与经济检查队内江支队长易孝思互相勾结（支队属自贡第二大队，是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查组的武装组织，直属军统局），在内江、资中等产糖区大搞下乡吊糖查封，河边禁运，酿成斗殴风潮，以致成渝两地达三个多月无食糖供应。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总动员会议特别会议。关于内江等产糖区，规定限价收购老糖（40年以前存糖）若干斤，余下老糖及新糖（40年生产）由糖商运销；主要销售区是成渝两地。这次派我驻内江。陈仪秘书长当面指示我要先把内江物价平定下来，应设一个评价委员会，所有商品必须标价出售。内江作出成绩再扩展至其他各县（内江区规划资中、荣昌、威远等十个县），并协助当地搞好物资供应。第一步把内江食糖情况摸清楚，督促当地食糖专卖局遵照总会的特别会议的决议精神，坚决执行，立即解除禁运，运销成渝两地；如有困难，立即密电回报。我于41年二月间到内江，当时内江县长是易元明，民食供应处处长是罗远猷，农民银行经理是陆某某，内江制糖公会主席是李汉文，食糖运销公会主席是温建勋，经济检查队支队长是易孝思，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局长是曹仲植，帮办（即副局长）是张川，内江食糖专卖分局局长是黄某某。我从各方面了解食糖风潮情况，得悉这次风潮是食糖专卖总局，指使内江分局与经济检查队互相勾结干的，不分新、老糖，何时产、运、销，采取一律查封。河边停泊的糖船，一律停止运走，听候清查。关键问题是食糖专卖总局曹仲植把持一切。要解决问题，必须向他做工作。我去拜访曹局长，他竟要起老资格来了，开口就是总动员会议里哪个是他留美同学，哪个又是老同事。还说："你要了解川康区食糖情况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些；至于内江食糖情况，我可不大清楚，你去问内江分局黄局长吧。"说完立即端茶送客。我碰了一个大钉子。第二天我去会分局黄局长，问他河边糖船禁运及四乡到处吊糖查封的原因。他说："新老糖混杂不清，老糖存量又不实，所以进行暂时禁运和查封。"我要他照国家总动员会议的特别会议决议文件办理，他说总局还没有发下来，要我向总局曹局长洽商。我又去会经检队易孝思，把总动员会议的文件给他看后，要他坚决照总会指示办理，立即停止下乡查封食糖，他当即表示不愿意照办。接着我又去会制糖公会主席李汉文，他说："所有红白糖及糖清的产、

销、存数字都是正确的，每月每户都有月报表送专卖局、税务局、县府及本公会。”并立即把上月的月报表送我一份。我问他为什么专卖局还要去查封？他说这中间就是等“拿言语”（送贿）。“言语”拿顺了，老糖可以变新糖，“言语”拿不顺，新糖就要变老糖。我去会食糖运销公会主席温建勋，他讲在河边的一百多只糖船，全是正当糖商，一切手续都完备，运单税照等全部都在专卖分局，现在全部扣下一律禁运，听候审查，多数食糖都在流化了。我把所得情况拟一密电发到总动员会议，请示办理。第二天由我召集易元明、易孝思、李汉文、温建勋、黄局长和税务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，听取食糖收购及运销情况，进行协商启封开运。最后决定：（1）暂时停止下乡吊糖和查封存糖；（2）新老糖的产、销、存数量，由制糖公会负责审查造具花名册，送税务局和专卖分局审核后再行开会研究；（3）河边糖船，由食糖运销公会负责审查造具花名册，送税务局和专卖分局审核后逐步放行。以上各项决定，限三日内造报。曹仲植得悉后，第二天就派副局长张川开他的轿车来接我到他家中吃便饭，并带来两千元现金，说曹局长怕我的开办费不够用，先借点给我，将来总动员会议兑款来再还给他。这是他在川康两地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我想到收下会受制于他，如果将来资、内两县又搞食糖查封禁运，产运糖商是受害无穷的，所以我婉言谢绝了。同他一道到曹家中，曹很谦恭地在大门口来迎接。首先申明他那天没有与我详谈，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事，说好说歹的都有，使我到各处去了解情况后，再与我详谈，就比较清楚了。又说那天星期无事，他太太是广东人，特地作点广东家常菜给我吃，菜虽不好，但是太太亲自作的，希望我不要客气。饭后我说明国家总动员会议这次特别会议决议的精神，文件总局亦已收到，希望曹局长督饬内江分局坚决执行。河边糖船逐步放行，以便供应成渝两地。收购存糖问题，照昨天开会决议办理。决不进行查封，免得风潮扩大，大家不好交代。曹说：“一定遵照总特会议决议办理。不过根据内江实际情况，以前分局掌握的数字不正确，给糖商钻了空子，互相勾结走私。两公会的登记，大有出入，不得不进行清查，因为新老混杂，河边糖船亦须清查后才能放行。对有囤积居奇的给以查封听候处理。这是过去的情况。周专员来内很好，希望大力支持内江分局进行工作。”后来由公会及专卖分局开几次会议，原则上根据第一次会议的决议精神，停止下乡查封。河边逐步审查开放。从表面上看来，风潮似乎平息了，河边开放了。但暗中还是要“拿言语”。否则就藉故刁难。这时候我因失眠半个多月，突然双目失明，立即到成都就医去了，后事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一个多月后，各专员办事处撤销，国家总动员会议来电要我结束内江工作回去。改派成都川、康、鄂三省限政联合办事处，负责成都组工作（当时特派员系邹明初）。

在内江食糖专卖分局对食糖审查启运期间，温建勋主席曾对我讲过，有一位江津行商廖如波，有两载食糖，已停在河边两个多月，一切手续完备，不知何故被专卖分局突然查封禁运，现在糖已开始流化。廖是小本经营，要我向专卖分局说明情况，准予开放。我在电话上请黄局长审查放行。当时我的秘书张思政向我讲：廖有“政治问题”。我考虑“政治问题”不应由专卖局处理。下午黄局长回电话：一切手续无问题，可以放行，叫廖去办手续。隔几天在一次宴会上，黄局长把我叫到侧边，说廖如波的糖是运进解放区去的，有政治问题，曹局长看你的面子上才准放行的。我说：“你不是说一切手续完备，没有问题才开放的吗？政治问题与我有什么关系，亦与你们专卖局无关嘛！真的政治问题，应当交与宪、警，或经检队去办理，为什么你们把它处理？当时你为什么不向我讲明，国共合作并没有限制地区供

应。我们是谈的糖商运糖嘛，你不要乱说一通。”他反觉无词以对，大家只好一笑了之。后来我到成都就医期间，内江曹、黄、陆、罗等联名告我三条罪状，其中一条就是包庇共产党廖如波，放行几载食糖支援解放区。

在处理食糖的启封开运期间，时间已是5、6月间了，乡下甘蔗已中耕二次，等待施肥。蔗农天天成群结队地到农民银行要求发放贷款，闹得很乱。有一次宴会，温建勋告诉我，每年这时的蔗农贷款，早已发放，今年因为银根紧，子金高，一个比期（15天）是大二分（即20%的利息），原来银行把这笔款拿去放高利贷去了。这夜宴会农行陆经理亦在座，我向他说，农民每天几十几百地在街上闹，秩序很不好，希望早日发放农贷。他说花名册还未审查造齐，总行的款子还未下达，一时不能发放。第二天我把这个情况密电报告陈长官。这时陆经理派他行（农民银行）营业主任来向我说，陆经理同意借一万元给我，一个月还他，只要我同意，一切手续他替我办，月底净得子金四千元，如你急需钱用，可以先付子金四千元给我。我说不买东西，无须借款，婉言谢绝了。我想这与曹仲植送我两千元，事情是一样的，不过要的花样不同。我如接受这四千元，则内江蔗农的贷款，起码还要等待一个比期（半个月）。隔两天总会的密电回复，农民银行总行的蔗农贷款若干，已于上月底下达，要我督促立即发放蔗农贷款，造册上报。第二天农行陆经理来会我，说总行款已下达，但花名册审造不齐，要求十天内发放。我暗自计算一下，十天后又是一个比期，我就打开窗子说亮话：“陆经理，你行的款，不只是这笔蔗农贷款，何必一定要等比期后，不如将其它款项调拨发放。如再拖延，大家将来都不好交代。请你在三日内发放。上面的通知，想来你也收到，规定是立即发放。”后来决定五日发放，七日内发完造送清册。

由于上两次曹仲植和陆经理的送礼我没有收受，以致荣、隆、资、内等县给我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周宝器”，说鱼吃鱼，不腥臭，这种钱都不要，真是一个“宝器”。这是我由成都返内江，路过荣昌，拜访田粮处长王熙告诉我的，当时大家一笑置之。

从以上两件事情的处理经过和当时内江的风气看来，国民党当局所控制的经济机构和金融机构，纯是上下勾结、贪污行贿的集团。对于国计民生，不但毫无补救，反而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，对抗战有很大的阻力和破坏。无怪当时人民都说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，发出沉痛的慨叹。

周凤梧　通讯住地：政协江津县委员会



反对国民党政府食糖征实的经过

曾祥元　曾　翥

抗战以来，国民党反动派，执行着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、反人民的反动政策。在政治上拒绝任何改革，一贯压制人民。在经济上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，倚仗国家政权，利用抗日招牌，用超经济的手段，对人民实行极其蛮横的掠夺。因此，国民党统治区生产萎缩，货物奇缺，物价飞涨，投机倒把盛行；人民生活动荡不安；反动政府财源枯竭。而另一方面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少数金融巨头，横征暴敛，骄奢淫逸，大发横财，形成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反动政府财政经济上莫大的危机。为此，反动政府更是千方百计，残酷搜刮，吸吮民脂民膏。

一九四四年冬，对沱江流域的食糖，在原有重税基础上加收货物税百分之三十。这样一来，制糖业受到了严重打击。糖坊老板开初用压低甘蔗价格的办法，把负担转嫁给蔗农以维持其本身的生存。可怜蔗农却受到了更加严重的盘剥。

就在这个时期，国民党战场上，正值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转变；日寇垂死挣扎，急于要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交通线，发动了豫湘桂战役。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，拥有近百万大军，一触即溃，造成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的第二次大溃败。把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拱手送给了日寇。这些地方，都是内江食糖的销售市场。由于大批国土的沦陷，销售市场缩小，糖价猛跌，糖坊纷纷倒闭，甘蔗也就卖不出去；蔗农和糖坊老板都面临破产。制糖商为了自身生存，出于他们阶级的局限性，寄希望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“恩宽”。于是由于食糖增税而引起的请愿，就这样地爆发起来了。

最初由内江县糖业公会发起，并联络了资中、资阳、简阳、威远、富顺等地的糖业公会。经过协商，组成了请愿代表团。内江县有高伯川、艾延年、曾祥源等五人，资中有资中糖业公会的周仲元、陈克壮，资阳有资阳糖业公会张海山等三人，简阳有简阳糖业公会的傅殿阶等人。以内江县糖业公会为首。

开初向伪资中专署请愿。资中专员田伯施，在伪专署接见了全体代表。他好象表示同情，声称制糖业的问题，是沱江流域的一个重要问题；他愿意向伪中央反映。奇怪的是专员接见不久，税收不但没有丝毫减少，反而把征收法币改为征收实物——白糖的百分之三十。原来征税增收百分之三十的法币，由于货币贬值，制糖商仍有机可乘，而现在改为征收实物，负担就更重了，糖坊纷纷破产倒闭。据内江县不完全的统计，由原来五百多家糖坊，减为三百多家，倒闭关门的达两百余家。糖坊倒闭，蔗农甘蔗卖不出去，生计成了大问题。内江田少土多，土地多种甘蔗；甘蔗卖不出，粮价又大涨，原来市价约一斤糖可买一斤米，现在约一斤半糖方可买得一斤米。内江糖业的兴衰，对内江的经济影响很大；现在糖业奄奄一息，米价大涨，人民遭受苦难，经济濒于破产，整个沱江流域几百万人民均受到危害，义愤填膺，呼吁更切。于是请愿代表团又赴成都，向伪四川省政府请愿。一九四五年三月，伪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府主任秘书孟广彭在会议室接见代表团，总是应付、敷衍的话，不作具体回答。代表等又再三请求要谒见伪省主席张群，均遭拒绝。不得已，代表团在成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，请求舆论声援；不久，一些报纸就发表了这方面的报导。同时旅蓉学生会，纷纷散发传单，支持这次请愿。

向伪省府请愿无结果，内江县糖业公会乃动员糖商不交税，阻止白糖外运（因不缴税就得不到印花税票，无印花税票，糖是不能外运的）。因此，斗争便加剧了。糖业公会又请求国民党内江县党部、三青团、参议会、县政府给予支持，可是这些同反动政府的中央都是一丘之貉，不但无丝毫的支持，反而指使他们所控制的蔗糖合作社卖糖缴税，破坏糖业公会的措施。同时反动政府又在贷款上施加阻力，妄图使糖业公会就范。原来中国银行、聚兴诚银行可以用糖作抵押进行借款；现在这两家银行不能办抵押借贷了，压制糖商卖糖缴税，这样就更加深了内江制糖业的危机。

这时四川一些反蒋的民主势力，鉴于可以利用糖业公会请愿的机会给国民党蒋介石施加压力；经过一番活动，改组了请愿团。以资中周仲元为团长，内江钟汝为为秘书长（钟汝为，内江人，北师毕业，与熊克武、陈离等人在政治上有密切关系，陈离任成都市长时，钟汝为任社会局长），成员有：内江高伯川、曾祥源，资阳张震东，简阳傅殿阶等。于一九四五年五月赴重庆，向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央财政部税务署请愿。署长关××接见了代表团，仍是软拖应付。代表团鉴于这种情况，又找了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民主人士反映实情；并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当时重庆很多报纸报导了内江糖业请愿团的情况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这一消息，声援内江制糖业的请愿。内江旅渝学生会印发了传单，热烈支持。这样一来，反动政府当局甚感恼火。在第二次接见代表团时，关署长可能是恼羞成怒，态度异常强硬，声言不能减税，并斥代表团迅速离渝返内。可是代表团并未离开重庆，仍然四处活动，于是又第三次接见代表团。这次接见中，伪署长关××竟采用高压手段，声称代表团如不离渝返内，便以抗税论罪。在这种情势下，代表团由于阶级的局限性，他们不可能采取更为有效的斗争，只好愤恨而回。

抗日战争胜利，反动政府要即刻回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“劫收”，蒋介石又忙于准备内战，内江的食糖征实问题，对他们来说，已是小巫见大巫了，无暇顾及。因而作了妥协，把税率由增加百分之三十改为增加百分之二十五，并且可以交货币。制糖商的私利得到了满足，因为税金虽然增加了，但他们可以把它转嫁给蔗农，这场斗争就此结束。

注：（1）钟汝为口述：去重庆呼吁的代表被蒋介石派出武装部队，见人就抓，全都吓起跑了。

（2）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成都《华西日报》载代表对记者谈话：“现在征实之最不合理，使糖商无法忍受者，战前每万征税四十元，现在征实按规定标准折合计算，实达一百六十万元，而各种税率合并竟高达七千倍。”“财部上年十二月业已明令接受川省府建议，征实税率改定为百分之二十三，并按糖清折价八折征收后，旋复改变成议，另增三程。”“政府堂堂法令之朝令夕改，至于如此，殊为使人惶惑。”

（3）曾祥元：内江糖厂退休职工。曾焘：内江农校教师。

一九四七年内江蔗农请愿记

赵文林

处在四川沱江流域的内江县是全川产蔗中心。内江县农民，大都种蔗。原因是变价成熟，比种粮食强。但农民自己不能加工成糖，只能为制糖商提供原料。因蔗是以鲜汁熬糖，又是脚头货，只能出售给自己附近的制糖商，往往被限制蔗价，使农民吃亏。

一九四六年，抗日战争结束不久，蒋介石反动集团发起的国内战争开始爆发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。内江县的蔗价，自然也大受影响。蔗农除劳力外，肥料、牛租、地租（指佃农）等，都缺乏"垫稍"（周转资金）。因此，普遍采取预售，用挖肉补疮的"卖青山"方法，取得部分订金来作为种蔗的资本。有的头年底就预售明年的成品——成熟的甘蔗。一般都在春初预售。预售时，即议定蔗价，并订立成交合约为据（照工商交易常规订约）。蔗农按照合约用钱、交蔗（如有欠交、透支，还要受高利剥削）。当年全县蔗农的甘蔗每万市斤，预售价均在十四（万）元至十六（万）元之间，到下年将要砍交甘蔗时，物价已涨了一倍以上，蔗农每万甘蔗实际只进到五千斤的蔗款。而糖商相反，糖价也飞涨到一至二倍，每万斤甘蔗就变成两万斤，甚至更多。这样一来，农民纷纷要求重评蔗价，发出请愿呼声，展开前所未有的蔗农请愿"合法"斗争。

先由东乡的蔗农推黎兆奎为代表，组织起"蔗农请愿团"，在县城内向各机关人士呼吁，请求升价。继而西乡响应。如西乡礼茂乡，部分蔗农私下找制糖商曾仪阁，请将预售蔗价提高为现实市价，曾不允，蔗农举出代表，由段锡酬拟状，联名告到伪乡公所，与曾当面质理，乡长不能判断，一推了之。蔗农陷入伸告无门时，联名代表乃率队迳奔县城加入"蔗农请愿团"。还有黄桂华、王文臣等各乡蔗农代表纷纷参加。一时呼吁之声响遍四乡，不到一月遍及全县，声势相当浩大！

尽管制糖商老板们买活官府，软硬兼施，企图压下蔗农的升价要求；但当时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，"蔗农请愿团"始终坚持请愿示威，散发传单，例举《蔗糖成本对照表》（此表系笔者亲手编制）等大批具有说服力的文件，博得各界团体和人士的有力支援，并使蔗农代表住宿有地。同时，成立"生产促进会"，为斗争取得"合法"依据。众怒难犯，县政府在同年十二月，于内江县政府礼堂（现在内江市政府礼堂），有蔗农代表黎兆奎等几十名，制糖商代表晏辉廷等多人，由县长黄希濂主持"甘蔗评价"，推翻原有私人协议的价格，所有成交合约无效，一律评为每万市斤甘蔗的蔗价为法币三十（万）元，由官方布告施行。虽然没有达到蔗农提的最高价格四十（万）元，但也在原议价的基础上提高了一倍。最后以蔗农取得一定的胜利而告终。

笔者附言：

上述事件，乃本人过去亲历。是我在退休后回到家乡，才从回忆中写出。可能有某

些出入，特此提供参考，以便互相补正。

按：1946年12月1日《新民日报》调整蔗价每万公斤甘蔗为三十八万元。本文撰述者，现住居通讯处，威远县内江地区凤凰山煤矿。

另附录有关参阅资料：

（1）据重庆《新华日报》1947年2月1日载周永林《论糖蔗纠纷》指出："相持很久的内江蔗糖纠纷，据报载已由当局召集蔗农、糖房、漏棚及各方会议后获得解决。就今年说，这场纠纷暂时可告无事，但从内江糖蔗生产的本身说，问题的严重性，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，因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。"

（2）金振声《四川的糖业与国民党"专卖""征实"》：1945年3月23日，沱江流域四百万糖民，为了反对食糖征实百分之三十，曾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呼吁，请根本改善糖业政策。同年11月6日，内江四十万蔗农又派代表到成都呼吁，要求四川省政府严厉取缔预买蔗糖的剥削行为，并要求征收糖税只征糖清一次，其余一概豁免。四川省政府对蔗农这种正当而起码的要求，概未置理，且进一步实行镇压。

蔗的谣谚

阿　洪辑

△立春雨水节，甘蔗正放得。
△甘蔗杆杆长，适当放宽行。
△蔗苗长出"鸦雀口"，补苗正是好时候。
△甘蔗不上行，杆小少出糖。
△甘蔗不壅兜，等于到处丢。
△三月六月蔗农忙，挖了小行挖大行。
△六月六，蔗现肉。
△甘蔗杆儿节节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。
△解放来，人民生活大改善，
　好比顺起吃甘蔗，一节更比一节甜。
△甘蔗林头搬干包谷。（绕口令）

解放前内江食糖经营简况

宋子麟　供稿　　傅长澜　整理

从抗日战争时起到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止，内江糖业基本上是产、制、运、销分工经营，有制糖业、运销业、冰桔业等行业。当时的国民政府，为了征税和食糖经营业的管制需要，把这些行业组成“制糖公会”、“糖业运销公会”、“土河糖业运销公会”、“冰桔公会”。

（一）制糖业

制糖业分糖房、漏棚两个专业。经营糖房、漏棚的业主，绝大部分是地主，富农，少数是城市工商业者。

糖房以甘蔗为制糖原料。种甘蔗的蔗农，多在蔗种下土时贱价地卖给糖房（行业语叫做“卖青山”）。糖房以甘蔗生产出两种品种，一是红糖（又叫水糖），二是糖清。一般开设糖房业的，资本并不雄厚，只好把糖清卖给漏棚。当时的糖房，生产非常落后，都是以牛推石碌，以石碌榨蔗，再将蔗汁煮进糖锅进行熬煮。这样的土制方法，原料浪费大，因为用石碌压蔗，糖汁压不尽，如以一万斤蔗汁，能制成糖清或红糖一千斤，这也就算顶好的成分了（叫做丁对丁）。抗战初期，有白马庙晏济原在石碌中加钢轴心，减轻了牛的劳力，使生产工具有了些微改进。至于甘蔗品种，原来只有“阳县干”、“芦茅蔗”，抗战期中，由四川建设厅在内江圣水寺创办起甘蔗试验场，由留美专家陈让卿主办，几年后，有的改用了省优良品种——印度蔗、爪哇蔗、台蔗等等（它们的含糖量比“阳县干”、“芦茅蔗”都多）。这是内江糖业一个进步。

漏棚以收买糖房的糖清为原料，以漏钵、漏罐为主要生产工具。漏棚，主要是生产白糖，生产的方法是：把糖清盛在漏钵里，用净泥土酱压在漏钵面上；漏钵底有一小孔，它放在漏罐上，使由净泥土浆压出来的水，从漏钵底孔流出——流在漏罐里。漏出来的水，叫做“原水”。糖清中的水份被压干后，剩下在漏钵里的就是白糖了。“原水”，经过熬煮提炼，再盛在钵子里，同样以净土泥浆压在钵面上，又同样以漏罐接受从漏钵挤压出来的水（叫做“漏水”），此时漏钵内的“提炼物”又被压成了白糖，这样的白糖称为“转火白糖”。

抗日战争前，内江就有了制白糖的机具——离心机，制出的白糖称为机制白糖。它比土法压出的白糖，要洁些，要白些，只是甜味的浓度不及土法制出的白糖。当时运用机制工具的糖厂有华农糖厂、开源糖厂、茂市糖厂、中国炼糖厂。这些糖厂，大都是官商合办：

中国炼糖厂，是中国银行同内江制糖业公会合办的；

华农糖厂，是四川省建设厅办的，后由内江合作金库接办，再后则由邓屏翰、王启宇、宋子麟诸人承租厂址来大量生产桔糖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内江东兴乡伍所南等人，曾筹办川糖公司，试图以民间资本与官家资本角逐一场；也试图在生产方式上进行一些改革，但未成功，只不过反映出内江人民向往糖业进行机器生产的愿望。

内江县产糖户（糖房、漏棚）最多时达到过八百多户，分散在全县四十几个乡、镇里。产糖量最高年辰为八千万斤糖胚（包括红糖在内），领金堂、简阳、资阳、资中、富顺诸县的糖产量之先。

糖房榨蔗的蔗余称蔗渣，主要用作熬糖的燃料；漏棚压糖的糖余称漏水，可用作制酒和酒精。抗日战争年代，内江的酒精业曾发达一时，主要就是依靠漏水作原料。较大型的酒精厂有资源委员会四川酒精厂、军政部茂市酒精厂、银山镇无水酒精厂、椑木镇中川酒精厂，其它还有不少的私办小酒精厂。它们生产出来的酒精，可以代替汽油，成为机车的动力，所以酒精厂应运而生，由此而漏水也就身价十倍。

（二）运销业

在沱江中下游的沿江县属，大都产蔗、制糖，而销售则以内江为集散地。内江糖业运销公会的会员户，最多时达三百余户。由于糖的集散在内江，经营糖业的运销商便在内江广设字号，居买方的字号，以来自富顺、泸州、合江、江津、重庆、长寿、涪陵、忠州、万县、合川、半都、宜昌、沙市、汉口等地为多。

这里着重介绍不同品种的不同销区。

土白糖绝大部分销四川各地，省外销量很少；

红糖以云南、贵州两省的销量最大，省内只销少数；

桔糖畅销湖南、湖北，如宜昌、沙市、汉口、常德、津市、襄阳、樊城，还销陕西产棉等地（产棉地区称桔糖为药糖，摘棉桃时，不吃肉可以，不吃药糖就不行）和甘肃各地；

冰糖分原冰糖和转火冰糖，原冰糖销四川本省，转火冰糖销云南、贵州等地；

冰水煮的黑瓜片，瓜元，萝卜砖、条、元（黑色，尾子带苦味），云、贵也畅销。

关于桔糖的运销，由于销路多靠船运，运到宜昌、沙市、汉口，运途长，需时久（要三、四个月甚至半年才能运到），遇大风、洪水又不能行船（系木船，大的载一百吨，小的载三十或四十吨），遭到风险、水险，就有赔本的可能，因此，经营这项运销，必须有较多的资金。这是交通运输给桔糖运销造成的困难。除船运外，陆路方面只有甘肃帮是买方，但他们多在淮州、石桥买，运输靠人力背，背到甘肃又在该地背棉烟回四川。所以，这路的运销量是不大的，内江的桔糖运销商，大都不去经营。

运销业的一个分枝，即上河糖业运销。内江县专门成立了“上河糖业运销公会”。这个公会的会员户不多，最多时也只有百来户，少时只五、六十户。上河运销是专一经营红糖的运销，由资阳的南津驿、王二溪，资中的球溪河等地的运商收购，然后运内江集中销售，有时金堂、简阳的红糖也运集内江。它的销路，一是长江上游南岸各地，二是云、贵地区。红糖的包装是要分季节的——夏季以前销的用竹篾包装（因易溶化，内江产的红糖尤易溶化），夏季销的用木桶包装。竹包每包重量约三百市斤，木桶装每桶重量约五百市斤。当时，经常运集内江存岸的货量都上万数（包或桶）。经营上河糖业运销的有几个大户，即内江的李吉安，资阳的郭守忠，球溪河的罗焕珉，其中又以内江李吉安为大户中之最大者。

（三）加工业

内江的糖业加工业，作坊多集中于内江东兴镇，城内东坝街也曾有过几户，不几年，也都迁到东兴镇。进行糖业加工的技师得出一条经验：沿东兴镇河边的水，升冰要多产成份，而且加工出来的货品，颜色更好。

加工，即以白糖为原料，加工为原冰糖、转火冰糖。剩下的转火冰水，即用来制作大宗的黑瓜片以及瓜砖、瓜元、瓜条，还制冰桔大萝卜和桔红。这些加工货品，销云南、贵州、甘肃等省。

加工的糖食品，除趸销外，也开设门市进行零售。零售中，也零销红糖、白糖、冰糖。业务范围小，资本也不多。

内江的“小锅蜜饯”，是随着糖业加工以及加工品进行零售的情况出现的。起初是由有钱且有一定加工技术的人家尝试开始，为家庭自作自享之用，尔后，便成为面向社会的生产了。清时，内江以冰宝、冰塔为加工珍品，后来，“小锅蜜饯”则取而代之，成为内江甜城桂冠上的一颗明珠。抗日战争时期成了内江蜜饯的极盛时期。当时，有铨源老号、协昌、天利生、太华、艾相全、复兴荣专营蜜饯的作坊和门市。蜜饯品种的多样化，以铨源号为开路先锋，它选用的菜蔬有姜、海椒、茄子、苦瓜、东瓜、丝瓜等等，这些菜蔬经过蜜煮，能做到性变而形不变，即海椒不辣，苦瓜不苦。后来的协康、协群、兴昌等店，起而直趋，于是使内江蜜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名产食品。它不仅名扬全国，甚有海外客人专邮托寄内江的蜜饯。

附：糖业运销商的经营十诀

宋子峰

一要掌握产区的产量；
二要了解产品掌握在哪些人的手中；
三要注意销区是丰年还是灾年；
四要打听好运输路线是畅或有阻；
五要了解销地的购买能力的变化；
六要分析各地的涨、跌原因；
七要充分运用经纪透来的情报；
八要涨时不怕高价买，但掉手要快；
九用人取其精干，报酬再多也要用；
十运输工具和存栈都要一一调查。

原内江甘蔗改良场设置规模

袁正铭

原直属于四川省农业改进所（在成都）的内江甘蔗改良场，后又称做甘蔗实验场和甘蔗试验场，约于三十年代中期，设置于内江（最初由四川大学农学院与四川省建设厅合办）。设置的前提：主要是发展四川食糖的生产，内江是四川产蔗、制糖的中心，以便于对川糖主要原料甘蔗的品种、种植，进行研究、试验和推广。现仅将其设置规模梗概情况简述如次：

一、场址、场房的设置：

场址——选建于原内江县城西郊沱江河畔，成渝公路侧下圣水寺附近，与原华农糖厂紧邻。交通方便，地势平坦，土质优良，灌溉、用水水源充足，共辟有田土一百余亩（田少土多）。解放前后增至300余亩。

场房建筑——共设立有办公室、试验室、陈列室、温室、气象测量台、保管室、职工食堂、宿舍以及农场。

1.办公室：其中分设有场长、股长、总办公室等办公室。

2.试验室：即化验室，包括下设小型压蔗室、制糖室、化验室、研究室等室。

3.陈列室：内设有各种甘蔗标本，蔗、糖样品，以及各种测绘图表、图册等陈列小室。

4.温室：其中特设有玻璃装置的温室，以促进甘蔗的生长发育，和进行蔗种越冬的试验与研究。

5.气象测量台：用供每日测量气候、温度、湿度、日照、雨量、风级、风向之用。

6.保管室：用以分别储藏保管各种原料、产品，以及各种工具、机械等物资。

7.农场：系用一座旧式糖房改建，其中并包括猪、牛饲养的用房。

二、组织机构（包括人员编制）：

场长下设四股一场。

场长——设场长一人，负全场总责。

四股一场——即总务、蔗业、糖业、推广四个股，一个附属农场。

1.总务股。股长一人，股下设立会计室及有会计、出纳、事务等人员多人。

2.蔗业股。股长一人，技术员二至三人，助理技术员二至三人。

3.糖业股。股长一人，技术员二至三人，助理技术员二至三人。

4.推广股。股长一人，推广员二至三人。

5.农场。管理员二至三人，工人共约二、三十人。

三、业务范围和开展情况：

（一）总务股。管理全场行政、财务、采购、保管器材及职工生活福利等事宜。

（二）蔗业股。负责管理本场甘蔗的试验研究、培育繁殖、栽种生产和土地的使用规划。

关于土地使用情况。大体分作试验地、繁殖地、生产地三个大的区划：

1.试验地。对甘蔗的改良主要是作了：分杆行试验；区域试验；品种比较试验；施用肥料的比较试验。

2.繁殖地。专门用作良种甘蔗的繁殖，大面积栽培优良蔗种，以作种蔗推广和大批供应制糖优质原料之用。

3.生产地。对本场所有的水田，用以栽培水稻；部分少量的土块，用以栽种蔬菜和饲料。

关于当时改良繁殖甘蔗的品种名称、来源及其特性：

品种名称：

（1）本地原种（土种）。计有芦茅蔗（芦蔗），阳向蔗（洋响杆或阳县杆）、建南蔗（按：是否系为剑南蔗，待考。）、土红甘蔗（亦名脆红）、洋红甘蔗。（后三者，主要当作生吃果蔗用。）

（2）引进良种。计有：

1. C0290（印度290）、C0291、C0292、C0281、C0282等；

2. POJ2878（爪哇2878）、POJ2725、POJ2714等；

3. CP29—116（美洲29—116）、CP10—116；

4. 台湾蔗多种，如台蔗8号、10号、12号……等。

品种来源及其特性：

（1）土蔗种芦蔗、阳向蔗的来源，历史较早。大约自内江县开始有旧式制糖业生产以来，就只用的这两种甘蔗制糖。芦蔗以杆上生长的颜色不同，分为红色、白色两种，生长适应性强，并颇耐瘠土，其最大的缺点是杆多中空、含糖量低，仅占25%左右；阳向蔗。杆小，蔗皮表层带黑色花纹粉末。味甜，含糖量较高，约占28%左右。其缺点是性脆，产量极低，不能大量成批栽种。

（2）引进繁殖的优良蔗种。在甘蔗试验场成立后，约于1931年左右，即从广东等地，引进了外地正繁殖推广的多种优良蔗种。其中经该场多年的栽培和试验，仅培育出印度290、爪哇2878、美洲29—116三个最佳甘蔗优良品种。第一产量高，每亩能产上万斤；第二品质佳，含糖量高，糖分达28—32%。这三种良蔗的形态和特性是：

1.印度290。植株中形，高约6—7尺，直径1寸许。杆呈红色。质地厚实酥泡，含糖量高，糖分高约28—32%，每亩可产8—9千斤，是制糖优良蔗种原料之一，人们亦常喜欢将它作生鲜吃用。

2.爪哇2878。植株较高且大，高约7—8尺，直径1.2—1.4寸，杆色带淡白色粉状物，质地较硬，含糖分量高约30—32%。产量亦最高，亩产1—1.2万斤，是当时制糖的最佳原料和最优良的品种。

3.美洲29—116。植株中型较高而大，高约7—8尺，直径1—1.2寸。杆色表皮带黑色粉末，质地较泡，含糖分量高，约占30—32%，产量亦高，亩产可达1万斤左右，亦为制糖优良原料品种之一。

（三）糖业股。其业务职责，主要分压榨、制糖、甘蔗和糖品分析化验及其试验研究四

个大的部分。

1.压榨：将要试验的各种甘蔗，分别用小型压榨机，将蔗压榨出原汁，以供制糖分析化验，考察其糖分含量。

2.制糖：将压出甘蔗原汁，用铁锅灶熬制成糖浆，再用小型离心机，分离成白糖、黄糖及糖蜜，以供分析试验，检查其糖分高低，并定其蔗种及糖质的优劣。

3.分析化验：将制成的各种甘蔗类型的糖质，进行化验分析研究，精密鉴定其产量和质量的品质优劣，以作良蔗推广的准绳，并同时对土壤，肥料等进行分类对比和化验研究。

4.试验研究：将每年各种试验甘蔗和考验的糖质情况，逐年记载，积累资料，以便不断进行研究试验和改良推广。

（四）推广股。将蔗业、糖业股所得成果，配合对各地区的土壤、气候条件的调查研究，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指导，将优良甘蔗品种，向本地甘蔗主产区不断进行试种和大量的推广。如该场多年试验研究，引进繁殖出的印度290、爪哇2878、美洲29—116三种良种蔗，在1945年前后进行了大量的推广，高产质优的良种蔗大大地取代了低产质差的土种蔗，对当时内江蔗糖产区的甘蔗、食糖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。

（五）农场（部门）。除负责甘蔗良种的试验研究培育种植，负责要大量推广的良蔗的繁殖与栽培外，并经营水稻生产，以及养鱼、饲养家禽鸡鸭、饲养家畜猪牛等的副业生产。

四、人事更替和对推广良蔗情况的一点补充：

1.人事更替。1935年起，原内江甘蔗试验场首届场长为陈让卿老先生，任职约十余年（现在西南农学院作教授）。后由周可涌继任场长（现为福建农学院教授，副院长）。约于1943年由陈翰珍继任场长，至1946年春又由刘季昆继任场长，一直任到解放。另有刘石夷同志，1938年至1940年在该场任职（技术员）多年，解放后曾任甘蔗试验场场长及内江市副市长，现为内江市政协副主席。

2.推广良蔗。本文撰述者袁正铭，内江县人，1943年秋由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合川稻麦改良分场，调到内江甘蔗改良场任蔗业股技术员，以技士职称管理蔗业试验研究工作，经本股试验研究总结，在1945年曾将本场引进培育选出的优良蔗种印度290、爪哇2878、美洲29—116三种，进行示范推广。并从本场购运以上三种良蔗三千斤（即各一千斤），用船运到本地区白马庙上岸，由凌家乡周子均、杨作周二糖房，方碑乡张海斌、张利槐和袁正鑫以及本人家里的几个糖房，分别先行栽种示范，次年后即在该乡区等地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，相继内江产蔗各地将这三种良蔗普遍栽种了起来，对蔗、糖生产的增产增收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，很受群众和制糖业的欢迎。此类良蔗种，一直到1960年以后开始逐渐退化，近五年内则已全部淘汰消除，由解放后新引进、培育出来的新良蔗种，取而代之了。

1945年本人离去甘蔗改良场的职务工作，从事于内江师范、中学教学。1947年春，本人曾由伪四川省府指派参加台湾糖业实习团，去台湾实习考察糖业生产。抵达该地时，即从台湾选挑了十来种台湾良蔗，由航空托寄回甘蔗试验场刘季昆场长。在当年四月份，从台湾返川回内江时，又亲身带回了一些台蔗良种，以供本地试验之用。由于解放后，长期脱离了甘蔗改良科技研究方面的工作，对带回的台蔗良种，与目前推广台蔗良种间的试验研究，与新的引进繁殖情况，就无从洞悉和了解了。

△ 袁正铭。现年67岁，原中央大学农业系毕业。

通讯住地：内江县方碑公社。

华农糖厂与内江蔗糖生产合作社的建办

刘建纯

华农糖厂开办于1940年，其前身为四川省甘蔗试验场之试验糖厂。后因需作较大型机械榨蔗制糖试验，没有资金添购机器设备，邀请大华公司投资，甘蔗试验场亦划拨出制糖试验室经费作为投资股本，成立官商合办“华农糖厂”。由原有一组压蔗机，增为两组压蔗机；原有四部离心机，陆续增至十部离心机。前后还置办有锅炉两部，蒸汽机两部，发电机一部。

熬糖（糖浆蒸煮）、晒糖（湿糖干炼），仍用土法为主。每日压蔗30—40吨，压蔗期约八十天，能产糖清二百吨左右。自产及加上收购的糖清，共约六百吨上下，可产白糖约三百六十余吨。较土法泥压制糖多提取白糖一百八十吨左右，桔糖则要少产一百吨左右，但产值则高于土法制糖，而管理机构等开支却又大于土法（漏棚）制糖。

华农糖厂表面看来为机制糖厂，但实际并不算全机制，规模还是很小，而管理费用及技术人员开支却很大，兼以战乱不安，法币贬值，物价不断上涨，糖产品外运滞销，生产因之长期呈现不景气的现象。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，台湾收复，该厂认为四川糖业设备落后，蔗糖的生产率低，投资成本高，运输条件亦差，远远抵不上台糖的内销，乃于1946年宣告停办。华农糖厂，开办的时间不长，其规模还不及现在日榨蔗30吨的小机榨红糖厂，但它却是开创了四川机械榨蔗、制糖的先声。

为了蔗糖生产的发展，使农工商合为一体，减少种产销间的不少矛盾和弊病，在1936年冬，甘蔗试验场即曾提出有最好能组织蔗糖生产合作社之倡议。迨至1939年秋，由甘蔗试验场场长陈让卿向四川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及中国银行，把组织的必要和具体办法，作了正式的报告和进行了洽商。省合作社乃派出了林涤非，中国银行省行派出朱亚强，前来内江组织成立了蔗糖生产合作社及中国银行农贷办公室。当年即在内江、资中等县，发放了蔗糖生产农贷款六十来万元。官面看起来，这是件大好的事情，但在当时腐朽的旧社会，反动政府的统治下，矛盾重重，百弊丛生，其间关系错综复杂，蔗糖生产合作社成立不久，便很快地夭折了。

△ 刘建纯。现年70岁，原工作于甘蔗试验场，现内江制药厂（原三元糖厂）退休职工。

内江糖房遵义开

（蔗糖生产小史话）

陈靖方

过去内江制糖，多用的是土法榨蔗和炼糖。经营榨蔗、熬糖浆的，叫做开糖房；只经营买糖浆，转漏提炼白糖的，叫做开漏棚；大多经营制糖业的是糖房、漏棚一齐开，便叫做开糖房漏棚，后来因糖房、漏棚很少分开，就统用“糖房”这个名称来代替了。解放后以“糖房”的设立，与“作坊”的性质类似，乃将“糖房”通新改写作“糖坊”。

原世居内江县城里的陈石渔老画师，本来他一生多从事于绘画工作，但他也是一个极热心兴办实业的一个人。在他三、四十岁的时候，便在贵州遵义一面卖画，一面替当地官家开办过石印局、蚕桑局、陶瓷厂和火柴厂（红头火柴）。由于他在遵义住的时间较久，见当地人很喜欢糖，而本地又不出产，吃、用的糖大多是从内江由山路运去，就是运去的红糖也特别“稀奇”，自然糖的价格也比较昂贵。为了能解决当地对糖的食用和供销，他便在思想上，逐渐产生了这样的念头：在遵义也开设一座象内江那样的糖房！遵义本地不大量出产甘蔗，贵州与四川连壤，土质、气候相差还不太大，对甘蔗原料不妨进行移栽试种，广为推广。这样本地能产糖了，运费减少了，糖的价格也就便宜了。消费糖的人感到方便，生产糖的人也有利润可得，这样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？

可是，开设糖房必需有一笔较大的资金，陈石渔家境清寒，主要是以画为业，只有绘画用的小笔，那有开办糖房资金的一大笔？他把这筹划与几个殷实的朋友提了出来，吴蕴猷等几个朋友极为赞成，大力支持，很快便筹集了资金，由陈石渔出人、出力主持筹办。约在1921年冬，陈石渔便从遵义回到内江，约集了过稿匠、熬糖匠、白糖匠、刀把手、饭头（煮饭的），甚至放牛老幺，开办糖房那一套的全部人马，过了新年，便各随身负运着行头、蔗种，齐齐普普向遵义进发。到了遵义，在当地地方和农民的热烈支持下，便忙着放植蔗种，建房舍，盖八角亭，砌熬糖灶，打石辊子，打黄缸，烧漏钵漏罐，置办榨蔗、制糖所需用各项大小工具。经过大半年多辛勤的筹建，到了下年冬天，放植的甘蔗成熟了，设备也筹建就绪了，糖房正式“开榨大吉”了！当“开榨”的第一天，远近的人们，都成群结队地前来参观，可热闹极了。当地人们真说不出的高兴，遵义新开设起了第一座“糖房”。接着，红糖生产出来了，白糖也生产出来了。好的红糖有的还用“模子”浇凝成椭圆型的红糖饼，糖饼上盖印“肇新糖房”四个字的标记，成为了当地送人的珍贵礼品。出产的白糖略呈黄沙色，从颜色上看来比四川内江产的白糖要差一些，白糖每斤价约三角，比外地运去的白糖的价，就相因多了。当地的人们也最喜欢买用遵义本地新出产的红糖和白糖，这件盛事，在当时是把遵义城内城外都哄动啦！

在遵义开设的内江式的“肇新糖房”，第一年、第二年成效还不错，有一些盈余。到了第三年，却因遵义遭到了天旱，甘蔗受了损失减了产，糖房也折了大本，几年辛勤经营，一旦付诸流水，在遵义开办的“肇新糖房”，也就没有再继续经办下去啦！今天把这段情由提供出来，特为内江蔗糖史话上，增添一个小小的插曲。

二、人物仕女画师陈石渔绘事生涯

陈靖方

先父陈石渔，内江县人。原名其钧，字石渠。以画应世时，则一直题用“石渔”和“陈湘”这两个名字。公元一八八三年生，一九四三年病逝，去世正当六旬花甲之年。

石渔老人，在少年读书时代，就喜欢绘画，常到城里裱褙铺去仔细观看壁上裱褙的画，一看就是半天。后来和铺里的师傅们熟识了，还可将有的裱画借回家临摹，或用薄亮的纸“模”了下来，这样日积月累，存下了许多画帖，丰富了习画的蓝本，学画的兴会也就更加浓厚了。只因家庭经济拮据，无钱购买颜色，便用植物的果叶汁来代替；当时家里大人也不很支持，便只好个人偷偷地学画。

后来，年事稍长。在裱褙铺里，多次见到裱褙的杨春梯老先生的山水画，羡慕极了，便会同几位青年好友刘采臣、张善孖、邱特澄等，前往资中杨春梯老先生处，拜师求艺（即内江艺林，盛传的“百里求师”）。最初在杨春梯老师处学的是画山水，继而又再从杨重岳老师处，专门学习画人物。本来石渔老人原很喜欢画山水，走兽、花鸟……等，也都能画。因朋辈画友中多各有所专：刘采臣习草虫（尤擅画工笔蝴蝶），邱特澄擅绘写意山水，叶青擅绘花鸟，胡云秋（吟秋）擅绘走兽，官寒枝擅绘山林，郑素侯擅绘佛像，石渔老人则以擅绘人物仕女应工了。在与外地画友经常交往中，尚有游俊老师（善画山水），戴天老师（并善篆刻）。

关于石渔老人的仕女绘画：

石渔老人最先从资中杨春梯老师学画山水，后又从遂宁人杨重岳老师学绘人物〔现尚存重岳老师石印本人物画残本一册（1924年印刷），并有廖平、刘豫波等题跋〕因此，后来他的人物画，虽然吸取各家之法，又掺和自己的笔法，但仍存有杨重岳老师的笔法基调。每在茶余酒后，以余墨临写各名家画法。一般求画的主要是要求画人物仕女，也有“点题”的，如“八骏”、虎，墨龙，渔家乐、白衣观音（送老太太的）、麻姑、寿星（祝寿）、张敞画眉、举案齐眉、红袖添香（结婚）、佛像等。画佛像摹吴道子笔法，画达摩则用大折芦描，画其他人物仕女常用兰叶及铁线描揉合运笔。尝谓水墨画必具真功夫，着色可补画中不足处。一般是用小工笔绘画，间或工笔兼写意，画渔家乐则纯是写意，画像除炭精画外，也绘彩色像。我回忆老人所绘炭精、水彩像，不会逊于照片，因他对人物各部结构，素有心得，因此浓淡相宜，色调自然，别有风度，栩栩如生。他曾敬绘中山先生炭精像，祖母彩色像，至今尤深映脑中。约在一九三二年左右，曾应重庆陶专聘去任教，只因老人病足（严重风湿）一年便回内江。不久，“陶专”派专人携素瓷胎及用具来内江，请老人绘制，绘好即在我家设炉烧制加工。记得当时参与绘制的除老人外，尚有叶青老师，胡吟秋老师，其余的记不清了。家里那时也存有几件瓷器制品（茶盅、壶等），可是现在一件也未保存下来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